

中俄广播发展 对比研究

谢 飞◎著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中俄广播发展 对比研究

谢 飞◎著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俄广播发展对比研究 / 谢飞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043-6100-4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广播事业—对比研究—中国、俄罗斯 IV. ①G229.2②G2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6209号

中俄广播发展对比研究

谢飞 著

责任编辑 刘 君

装帧设计 水晶方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地质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100-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谁要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有头脑。”这是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普京对苏联解体的痛心又充满矛盾心情的评价。中国与前苏联两党、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多年密切合作的友好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中苏分歧，两国关系进入低潮乃至恶化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两国重新进入关系正常化时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中国政府建立了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历中苏、中俄两国复杂而曲折的两国关系必然引发国人特别是媒介从业者和媒介研究人士的强烈关注。因此，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下，谢飞的专著《中俄广播发展对比研究》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和专题对比研究的专业内涵。

中国、俄罗斯两国传媒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具有相似的媒介经历和体验，相互影响深远。前苏联广播开创社会主义广播模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留下不朽篇章。中国人民广播的创办得益于前苏联的支持，中国广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舆论工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中国广播借鉴前苏联广播经验创建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并在实践中根据自身的国情特色不断创新和发展。中、苏开创社会主义广播的共性时段是苏联广播从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广播自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中两国的共性特征是：计划经济体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靠国家拨款，基本没有广告。媒介定位为舆论宣传工具，宣传方式以单向传播为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

演变攻势,中俄(苏)两国传媒业经历不同的国家命运选择之后分别进入路径各异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国情与传媒政策不同,中国与俄罗斯广播业的发展也呈现了各自不同的媒介变革的国情特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广播媒介经历了媒介“自由化”至传媒失控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金融集团控制传媒的畸形市场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和普京时代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目前,多数传媒回归国有,形成了俄罗斯特有的“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传媒模式。经历重新整合的国有广播仍占主导地位,多元化的广播格局体现了“可控民主”下俄罗斯广播的国情特色。整体看来,普京时代的媒介政策促进了广播的多元发展,提升了广播传播效果,包括市场占有率和市场满意度。纵观俄罗斯近二十年的媒介转型,俄罗斯广播从前苏联时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国有制,经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激进转型到传媒失控和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垄断传媒时期,直至普京时代的国家重新控制传媒,表面看起来似是一个圆圈轨迹,实际上并非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而恰是俄罗斯传媒转型经历坎坷中的攀升轨迹,是一种有别于美国商业模式、欧洲公共模式,也有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广播模式。可以说是融合诸多模式的俄罗斯特有的广播发展轨迹。面对当今“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大背景,对俄罗斯广播发展模式规律性认识,包括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总结与反思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进入改革时期,中国广播随之进入渐进式发展变革时期。1985年广东广播推出“珠江模式”,使中国广播走出多年来“报纸有声版”的框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广播运作的先进模式并逐渐走出电视冲击的低谷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政府明确将广播定性为第三产业。加入WTO以后,传播市场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广播进入深层体制改革时期,引发了广播的“分众化”、“类型化”、“本土化”以及“数字化”和“网络化”等趋势,使中国广播进入相对平稳的上升时期。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渐进式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广播媒介正在进入深层变革时期。其特点是积极探索渐进式变革发展。面对21世纪国际环境与媒介融合的技术背景,中国广播

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媒介发展的共性规律模式,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媒介生态背景下进行“重塑广播”的传承与创新,从理论框架至实践规则以及经营理念等多方面进行拓展与创新,是中国广播人必需面对的时代课题。

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1. 尊重历史,客观评价了前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广播模式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前苏联广播在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媒介发展研究中,提到世界第一家广播电台,大多引证西方媒介史的材料,即“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兹堡的KDKA电台”。确切地说,美国KDKA电台是世界上第一家商业广播模式电台。同时,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广播模式的创新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非常重视发展广播,积极进行无线和有线广播的研发推广。在《苏联广播电视史》中明确记载:1920年莫斯科电台开始试验播音,1921年5月第一台扩音器在苏维埃大楼的阳台上正式对全民广播。列宁将广播称之为“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这个伟大的论断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肯定广播社会意义的伟人。本书中作者对前苏联开创了社会主义广播模式,其中包括节目内容和节目形态以及有线与无线广播并重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前苏联发展模式做了较充分的论述。

前苏联广播模式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事业发展提供参照模式,社会主义广播事业是世界广播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功绩在世界传媒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篇章。但是,倚仗工业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以商业广播为主体的广播模式在世界传媒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社会主义广播模式的创建与发展则较少提及,这反映了世界传媒研究的局限与歧视,也是重申20世纪前苏联广播和中国广播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广播模式的重要意义。

2. 将俄罗斯广播业置于全球化、特别是在“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大国话语争霸的平台之上,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俄罗斯广播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急剧社会转型期,社会陷入混乱,乃至多数媒介成为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其中教训值得深思。普京执政后,采取多数传媒收



归国有的措施,进入了俄罗斯特有的“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传媒模式。该书作者运用了较丰富、翔实材料,对俄罗斯广播的发展现状以及新媒体时代的俄罗斯广播发展趋势进行了从理论到实务较充分的分析和解读。当前,对俄罗斯媒介的系统研究多是报业和电视文化产业等,对俄罗斯广播媒介的系统、全面研究较为鲜见。从这个角度讲,作者为研究当代俄罗斯广播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和较深入的解读。

3. 将中国传媒的发展、变革置于渐进性社会转型的国情特色背景下,对中国广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的理念变革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受众变化趋势和频率专业化、节目品牌化从新媒体背景下“重塑广播”发展趋势做了较充分的分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播媒介应更加注重对自身功能的深层开发,主要体现在广播媒介功能的深层开发,包括媒介责任、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重视公共利益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论述,对中苏广播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力所能及的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分析,显示了作者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

该书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也是我的学生和朋友。谢飞有俄语语言学和新闻学的学科背景,在读博期间,搜集了大量有关俄罗斯媒介的第一手材料,学风踏实、务实,勤于思考,发表了多篇关于俄罗斯传媒的专题研究论文。由于对俄罗斯传媒领域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而俄罗斯广播媒介的文献资料相对薄弱,加之作者繁忙的教学任务,本书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水平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局限。特别在中苏、中俄的政治传播、文化对比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世界上最难超越的是自我,希望本书成为作者学术道路新的起点,力争今后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超越和突破。

曹璐

2010年1月

绪 论

一、中俄两国传媒业发展的可比性及比较意义

著名的法国比较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说过关于进行历史比较的两个基本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讲，比较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被观察的事物的某种相似，二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环境的某种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共性规律，但由于国情不同，亦具有各自特色。对于两者的可比性，两国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用比较分析法中“各种同类型的原因必然造成同类型的结果”这个原则来分析两国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都需要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就是说，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的改革背景和前提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在《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由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出于相同的模式，两国地理环境和文化渊源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最具有可比性，所以俄罗斯更要研究中国的经验。”^②作为上层建筑的大众传媒的改革同样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广播媒介。中俄广播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具有相似的媒介经历和体验，相互影响深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国分别进入转型时期，由于国情与传媒政策的不同，中国与俄罗斯广播业的发展路径各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广播媒介经历了媒介“自由化”至传媒失控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金融集团控制传媒的畸形市场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和普京时代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纵观俄罗斯近二十年的媒介转型，俄罗斯广播从苏联时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国有制，经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激进转型到传媒失控和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垄断传媒时期，直至普京

① 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② 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转引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比较研究》（第一卷），莫斯科，2000年版，第15页。

时代的国家重新控制传媒,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圆圈轨迹,实际上并非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而是俄罗斯传媒转型经历坎坷中的攀升轨迹,是一种有别于美国商业模式、欧洲公共模式,但又融合诸多模式的俄罗斯特有的广播发展轨迹。面对当今“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大背景,对俄罗斯广播发展模式规律性认识,包括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总结与反思的。

中国人民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战争年代在苏联技术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广播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传播正义与真理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之初,中国人民广播在广播内容、形式以及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和模式,这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广播业也进入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并重的时期。面对电视普及的冲击波,中国广播开创以“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听觉传播运作模式。在城市广播和频率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引领下,中国广播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渐进式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广播媒介变革也逐步进行,其特点是积极探索、平稳过渡。苏联解体引起世界格局变化,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政界和传媒界经过深刻反思,进一步明确了大众传媒的属性为党性原则、坚持国家所有制、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从而避免社会震荡和媒介失控。尽管中国广播改革还存在体制与机制等方面的“瓶颈性”局限,但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媒介与持续发展方面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深入研究中国与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变革与发展,对于两国传媒改革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俄罗斯经济学博士、全球化研究所领导人、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委员米哈伊尔·杰里亚金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一书中认为,俄罗斯的内部问题之多是世界少有的,这些问题有些是属于全球性的,因此,解决问题将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一种参照模式;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同时被当今所有文明扩张的对象,这使目前的俄罗斯成为人类社会唯一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内部及其微弱的作用力都将对与之相适应的国际上的力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①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一场空前的社会改革实验,其大众传媒的改革与变迁无疑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当今的俄罗斯被西方称作“后共产主义”国家,现行新闻体制及其发展态势在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它构成了当今世界新

①【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金禹辰/项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闻传播格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大众传媒到底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仍是一个重要的急需思考和探索的现实问题。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向标,是舆论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它在影响人的心灵、塑造人的价值观念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大众传媒发挥正面功能,则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如果被西方国家所利用,让出舆论阵地,则可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前苏联的解体和近年来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颜色革命”都给了我们历史的教训。我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国家综合实力日益提高,这被某些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威胁”,加紧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分化。国际舆论中的反华“噪音”升温,也使国人对国际话语霸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大众传媒必需提升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舆论引导,因此,也有必要对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的责任和功能进行深入研究。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与前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同年诞生,在广播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社会主义广播模式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世界媒介发展研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广播发展模式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从中反映当代世界媒介研究中的政治偏见和视野局限。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西方学者包括国内某些学者都存在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结论或倾向。因此,科学地、辩证地研究与评价苏联的广播事业,不仅关系着对世界首创的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的正确评价,也关系着当代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的发展与前瞻性决策研究。

二、“中俄国家年”为中俄媒体相互了解、频繁交往提供了契机

自1985年中俄关系正常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在政治互信、经济互补和市场相连的新时期^②,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加深。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决定互办旨在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年”活动,以把频繁有效的高层交往扩大到民间,并确定了2006年为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为俄罗斯的“中国年”。在国家年期间,中、俄双方媒体也进行

① 明安香主编:《全球传播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② 《莫斯科华人报》:《新发展带来新机遇——祝贺俄罗斯“中国年”隆重开幕》,2007年3月26日。

了近距离的接触。2006年7月25日至8月26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北京青年报》、北京交通广播等媒体记者组四十余人的“中俄友谊之旅”采访团,驾驶十多辆越野车,经满洲里口岸进入俄罗斯境内,横跨欧亚大陆,途经俄罗斯近20个城市,长途跋涉1.5万公里,最终抵达莫斯科。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参与活动的各媒体共发表各类报道作品五百余件,图片八百余张。此外,俄罗斯主要媒体和沿途地方媒体也对“中俄友谊之旅”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在庆祝仪式上对这次“友谊之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俄友谊之旅”是一个创新,中俄主要媒体记者共同组成采访团进行大型跨境采访,这在中俄新闻交往史上是第一次,对两国新闻合作必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①

早在2001年,中俄广播影视高层就已经开始进行接触和互访,并且成立了“中俄媒体工作小组”,隶属于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中俄双方媒体定期召开会议,不断进行互访与节目交换,这些合作深化了两国媒体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促进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2001年,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国周”活动上发表了题为《让媒体架起中俄友谊的桥梁》的讲话,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互相了解,这不单是兴趣所在,而且是我们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信息要迅速,要准确,要广泛。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卫星电视技术的发展,使这种需求成为可能,媒体占有空前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重要时刻,媒体可能成为信息战的主角,能够为某些国家或某些集团的利益制造强大的舆论,这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得到证实。”^②

中俄两国的新闻界、学术界的学者在近年也频繁接触。从2005年起,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共同举办“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至2008年已举办了四届,根据双方的意向,今后每年还将继续举行这样的研讨会来增进两国媒体的交流。研讨会主要是针对中俄两国的传媒现状互通有无,介绍各自的经验和发展趋势,每年主题不同,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也根据不同的主题来提交论文,之后结集整理出版。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中俄传媒业的发展是以尊重、认识不同国情文化背景下的传媒业为目标,通过互识、互补来促进两种曾经相同而后各自发展的传媒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中、俄媒体之间的频繁交往使我们对彼此的媒介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展示双方不同传媒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可以共同探

① 载新华网“中俄”年专题,2006年8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06russia/>。

② 赵启正:《让媒体架起中俄两国友谊的桥梁》,载中国网,圣彼得堡“中国周”专题,2003年8月23日。

讨、逐步总结具有国情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个性化媒介的变革规律。

三、全书的结构体系

本书从广播业的历史发展入手,阐述两国广播业的历史渊源与相关性,同时对当前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进行分析,勾勒出不同国情下的媒介生态,全书共分三篇、六个章节。

上篇主要从中、俄广播的历史共性入手,介绍两国相似的媒介经历。社会主义广播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产物,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电视普及之前,按行政体制创办的广播电台和遍及城乡的广播网使苏联广播在信息传播、文化教育、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苏联广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苏联人民打击敌人的精神武器。中国的广播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艰难起步的,各路军阀和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广播多半是军事目的或牟取暴利,国民政府的广播事业主要是为政府上层人士服务,并未向广大民众普及。当时广播的接收设备也不多,人民接触广播的机会很少,旧中国的广播无法深入民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建立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并从创建开始就投入了解放全国人民的战斗中。建国之初,苏联广播模式成为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中国广播在向苏联广播界学习中汲取了其中的经验,在媒介理念和业务实践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革”时期,中国的广播事业发展失衡,在宣传内容上一度成为“四人帮”重要的舆论工具,其中教训值得记取。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广播进入了振兴和持续发展时期。

中篇侧重探讨中俄广播面对社会转型选择的不同路径与发展轨迹。俄罗斯广播媒介经历了媒介“自由化”至传媒失控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其特点为传媒奉行“公开性”与“民主化”,后来导致传媒失控;金融集团控制传媒的畸形市场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表现为金融寡头控制传媒进而试图控制舆论和政权;普京时代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传媒逐渐回归国家,强调社会责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转型,俄罗斯传媒现状与1985年的形势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目前是国家作为媒介的宏观调控者,积极有序地组织推进市场化进程。俄罗斯广播业近期的发展方向则主要围绕媒介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广播业在多元格局下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传媒的转型,没有停滞不前,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重走老路,而是在经历坎坷中螺旋式的攀升轨迹,从中体现了俄罗斯传媒转型的独特道路。

中国的传媒改革采取“渐进式”道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基本性质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国家对传媒的宏观调控体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进传媒产业化发展。由于坚持国家所有制和党的领导,传媒改革避免了剧烈震荡和失控现象的出现,从而成为中国改革的推动力量。广播业的发展在经历了低谷期、调整期之后,现在已进入持续发展期,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例如体制上的局限;部分频率过分追求商业化、娱乐化;多年来形成的广播业条块分割,地方壁垒,行业模式等制度性阻碍开始凸显。目前,中国广播改革已进入深化改革的“瓶颈期”。如何从体制、法制层面和媒介功能的深层开发方面促进广播发展与创新,已成为中国广播业必须直面的战略性课题。

下篇对俄罗斯与中国传媒改革的理念、方式等进行思考与解读,从中、俄两国广播业的发展现状、发展路径、改革方式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国情特色。中、俄两国社会主义广播模式在世界传播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珍贵的历史价值,全球广播发展史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广播模式的凸显与社会主义广播模式淡化的趋向,在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内涵。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传媒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需要不断协调与平衡,社会转型时期党和国家要牢牢掌控舆论的主导权,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艺术,关注民生,畅通民意渠道,实现媒介服务的公平与公正,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努力发展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的理论框架与实践创新的成果,同时警惕西方传媒渗透与“颜色革命”,拓展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空间。

四、文献综述

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丘切特曾说:“理智理解不了俄罗斯,一般的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①俄罗斯是个颇受争议的国家,但是它的大国地位不容世界忽视。苏联的解体无疑又给它增添了许多话题,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与俄罗斯(苏联)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关系,苏联解体后,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广泛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农业等领域都发表过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宏观背景参考。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的繁荣相比,对俄罗斯传媒事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很多。总体看来,我国对俄罗斯大众传媒

^① 杨子岩:《站在千年轮回的边上》,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2月4日。

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苏联解体(1991年12月)之后,但在2000年前相关文献比较鲜见,2000年以后逐渐增多。最近几年相继有几本俄罗斯传媒领域的著作出版,不过对于俄罗斯广播业的研究论述尚为数不多。

(一) 对前苏联时期的媒介研究主要以介绍经验为主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有学者和相关部门对当时苏联的传媒业进行介绍,并翻译出版了一些书籍,其中包括:(苏)彼得库尔科夫等撰、蒋齐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的专著《怎样领导党报》;储华编撰、群众书店编辑部1951年出版的专著《苏联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央广播事业局1954年编译的《苏联广播工作经验》;费多罗维奇著、人民邮电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苏联——无线电诞生地》;《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著、人民日报社1955年出版的《苏联报刊工作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1955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由肖明著、广播事业局1956年出版的《苏联广播工作者代表团在我国报告和座谈的记录》;苏联对外国广播总局编辑、中国事业局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苏联对国外广播发展史》;1959年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与电视委员会编写的《苏联广播与电视事业资料》;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广播组编写、浙江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俄罗斯广播讲义》等。这些文献可能是我国第一批对苏联新闻媒体的介绍。而国外学者对于苏联媒体的关注最重要的文献便是美国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等在1956年编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书中将苏联的新闻模式称为集权主义模式,并作为“报刊四种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编译出版的这些早期文献主要是对苏联新闻模式和新闻经验进行介绍。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鲜有关于苏联媒体的介绍,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只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64年编辑出版的《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等一些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书籍刊物。直到1985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又出现介绍苏联媒体的资料,其中包括新华出版社1983年翻译出版的格·萨加尔著的《苏联名记者写作经验谈》;由张君珊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苏联广播电视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波·利亚森科著的《苏联功勋播音员》等。这些文献资料仅限于对苏联新闻传播事业的简介,而深层次体制乃至政策层面的弊端都未曾涉及。

(二) 苏联解体后从多角度对传媒转型的关注及思考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大众传媒在国家解体中充当的角色引起了各方学者的关



注。在我国,最早关注该问题的专著应该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也是从1993年开始,一些期刊杂志上开始陆续出现关注俄罗斯传媒转型的文章,目前可查到的最早的是徐锦栋的《俄罗斯的报刊出版业》,载《世界图书》杂志,1993年2期。在2001年之前,每年大约都有几篇关于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的文章发表在各类期刊上,主要有: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的《两种报刊 两种命运——俄罗斯的新闻现状》,载《新闻爱好者》,1995年2期;《松》与“紧”的变奏——现行俄罗斯新闻体制的演变及特点,载《国际新闻》,1996年4期;《俄罗斯报业走向市场》,载《新闻战线》,1996年2期;《俄罗斯新闻业现状浅析》,载《当代传播》,1996年1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研究员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角逐传媒界》,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2期;关寿双、徐小娟著的《俄罗斯广告市场研究》,载《俄罗斯研究》,1997年1期;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贾乐蓉编译的《俄罗斯:媒体与政权》,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3期;文武英著的《新闻宣传与国家利益——俄罗斯车臣战争新闻宣传的原则与手段》,载《中国记者》,2000年5期;于洪君的《俄罗斯社会危机与大众传媒》,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1期;《俄罗斯:第四种权力困惑多》,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3期;赵华胜的《变化中的俄罗斯新闻业》,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5期;曾宇的《渐变中的俄罗斯新闻体制浅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2卷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耀魁的《今日俄罗斯:多元化的媒介市场》,载《河北广播》,2000年4期;聂长云的《俄罗斯新闻业在过渡时期痛苦求索》,载《现代传播》,2000年6期;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总编辑胡太春的《世纪之交的艰难跋涉——俄罗斯部分传媒机构访谈录》,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1期。

总体看来,2001年之前研究俄罗斯媒体的文章非常有限,内容多是对转型期俄罗斯传媒业整体变化的观照,其中研究俄罗斯体制变化、报刊业变迁和媒体市场化现象的居多,对俄罗斯传媒寡头的垄断也有所涉及。

普京总统上任后,重新制定了治国方略和媒体政策,尤其是对俄罗斯传媒寡头的严厉打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此时,我国研究俄罗斯传媒的学者也逐渐多起来,期刊上相关文章的数量明显上升。从2001年到2006年,主要发表的文章有: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的《转型期俄罗斯新闻业透视》,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1期;武汉大学国秋华的《俄罗斯大众传媒自由化的理想与现实》,载《新闻传播》,2003年1期,《俄罗斯:自由主义与大众传媒》,载《传媒》,2003年2期,《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对传媒的影响与控制》,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总编辑王向东的《浅析俄罗斯传媒业的发展走向》,载《国际广

播》，2002年12期，《俄罗斯广播电视概览（上、下）》，载《国际广播影视》，2003年3、4期，《俄罗斯互联网及媒体扫描》，载《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3年12期；贾乐蓉、宁文茹的《俄罗斯媒介经济模式》，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8期；北京大学副教授李玮的《中俄传媒市场道路之比较》，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1期，《西方传媒的俄罗斯之旅》，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1期；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郎劲松的《俄罗斯大众传媒步入“普京时代”》，载《当代传播》，2001年2期；暨南大学吴非和厦门大学胡逢英的《俄罗斯媒体资本运作与政府角色》，载《新闻记者》，2004年11期；吴非的《论市场经济中俄罗斯电视传媒的多元化发展》，载《暨南学报》，2005年27卷5期；四川大学严功军的《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传媒政策的变迁及反思》，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4期，《俄罗斯网络媒体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载《新闻界》，2003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丹的《变化中的俄罗斯传媒》，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3期，《俄罗斯媒体：静悄悄的革命》，载《传媒》，2002年2、3期，《〈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3期等。

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对俄罗斯媒体的研究开始细化，领域涉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国家政策等层面。此外，还出版了几部专著，包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北京大学李玮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暨南大学吴非和胡逢英在2005年、2006年合著出版了《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200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大学严功军《变迁与反思——当代俄罗斯传媒转型透视》，2008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贾乐蓉的《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等。

在一些介绍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书籍和外国新闻传播史的教材中，有些篇章是专门介绍苏联和俄罗斯传媒业的。例如：徐耀魁的《世界传媒概览》，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合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炳均的《俄罗斯巨变》，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王英佳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力丹教授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冯绍雷、相蓝欣的《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安香主编的《全球传播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文献资料主要以时间线索为依据记录了俄罗斯新闻业的发展脉络。

以上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俄罗斯社会转型、国家政局变化和媒介演进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新闻体制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在《“松”与“紧”的变奏——现行俄罗斯新闻体制的演变及特点》(《国际新闻》1996年4期)一文中认为,当时俄罗斯新闻体制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自由放开阶段、自然调控阶段和相对稳定阶段,在这一时期,新闻体制的特点主要是:多元化的归属形式、多样化的干预形式,而且俄罗斯的新闻还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论俄罗斯新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怎样复杂,不论俄罗斯媒介的归属形式及对其干预形式怎样变化,俄罗斯政府(包括苏联政府)对新闻业的控制从总体上看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再由松到紧的过程。而后一个“紧”,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厦门大学吴非和胡逢英的《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从探讨普京总统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回溯到列宁、斯大林建构的意识形态帝国,反复探讨俄罗斯媒体体制的改革问题。作者认为,自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改革以来,俄罗斯放弃了苏共居于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意识形态朝着多元化方向自由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多元化带来的一切混乱与无所适从,这个现象一直到普京执政之后才得到缓解。普京对媒体秩序的重建将促使媒体成为推动俄罗斯重建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机制。^①

2. 从俄罗斯传媒转型动因、作用,传媒与政府及现实图景等角度进行研究

程曼丽教授在《转型期俄罗斯新闻业透视》(《国际新闻界》2002年1期)一文中认为,从国家社会转型的多维角度对俄罗斯传媒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为:管理上: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体制上: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媒体格局是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新闻理论是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等。从政治角度看,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俄罗斯传媒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这是较早对俄罗斯传媒十年转型系统论述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俄罗斯传媒转型第一个十年的全景扫描。

北京大学李玮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的变迁历程。该书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俄罗斯的大众传媒进行研究:1.大众传媒在俄罗斯社会变革中的作用。2.俄罗斯

^① 吴非、胡逢英:《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绪论,第3页。